



DOI 10.16603/j.issn1002-1027.2022.01.008

图工委的第二个十年

□ 李晓明*

2021年12月24日,高校图工委纪念了她的40周年。40年中,以“图工委”简称的机构或组织一共有四个,分别是:全国高等学校图书馆工作委员会(1981—1987);全国高等学校图书情报工作委员会(1987—1991);国家教育委员会图书馆工作委员会/全国高等学校图书情报工作委员会(1991—1998);教育部高等学校图书情报工作指导委员会(1999—)。

其中,20世纪80年代图工委名称的变化只是为了加强图书馆情报职能的一种微调,其性质、工作内容、秘书处机构等均无大的变化,因此将之混为一谈,称为图工委1.0。相应地,国家教育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家教委)图书馆工作委员会可以称为图工委2.0,在此期间,全国高等学校图书情报工作委员会也没有撤销,两个图工委并存了7年。教育部高等学校图书情报工作指导委员会则是图工委3.0。

图工委从1.0到3.0的变化都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基本上是40年中的第二个十年。经历过这段历史的各位同仁中,庄守经、朱强、陈体仁、江成、张杰1990年离开图工委,董哲潜、罗丽、张环、王晓红、姜源绿、郝雅梅、潘蕾等先后于1998年前离开条件装备司(以下简称条装司),和图工委一道完整走过20世纪90年代的居然只有我一个人。

20多年过去,我也将成为历史。借图工委40周年庆的机会,谨将我亲历的这一段历史用文字记录下来。下文提及图工委,凡有歧义之处,会标明版本;与所在段落标题定义相同者,即不赘言。

1 图工委1.0的谢幕

图工委及其秘书处虽在20世纪80年代一以贯之,但她在教育部/国家教委的挂靠单位也经历过几次变化。最早在高教(一)司(高教司分分合合,分开的时候,一司管文科,兼管图书馆)。后来图书馆的同志一再呼吁,应该参照文化部设图书馆司。努力的结果是(小)半个司:1987年成立了司局级单位“教材和图书情报管理办公室”(以下简称教图办),下设教材、出版、图书情报和综合四个处。依稀记得,教图办组班子的时候,肖自力、朱强都有任命文件,但他俩一直没有到岗,图书情报工作也一直没有落实到教图办,图书情报处(以下简称图情处)唯一的成员——1987年华东师范大学毕业的张环,成天给教材处打杂。教图办只存在了两年,1989年初与供应局合并为条件装备司(以下简称条装司),董哲潜同志从中国教育图书进出口有限公司转岗任图情处处长。这时候图书馆各项工作的重心还是在北京大学(以下简称北大),在图工委。

1990年7月,国家教委决定,将图工委秘书处从北大图书馆转移挂靠到国家教委条件装备司^[1]。具体实施意见为:条件装备司作为图工委的业务归口单位,负责指导秘书处的日常工作。秘书处的事业编制由人事司按机关事业单位人员管理。财务司继续按每年8万元划拨事业经费,由行政司财务处代管;秘书处干部的工资、福利、医疗保健及困难补助等均由秘书处事业费列支;秘书处的后勤由行政司按机关事业单位管理,秘书处向行政司交纳费用,等等。

当时,图工委的主任彭珮云同志已经调到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顺便带走了秘书长肖自力同志;常务副主任庄守经同志的主要精力转到了北大图书馆。1990年的变动主要涉及秘书处的年轻同志。其中,朱强、陈

* 李晓明,198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1982—1993年在全国高等学校图书馆工作委员会秘书处工作,1987年任副秘书长。期间和以后编辑《大学图书馆动态/通讯/学报》20多年,为编辑、副主编、主编。1993年到国家教委/教育部条件装备司图书情报处,任副处长、处长。1998年任教育部高等教育司教学条件处处长,2012年退休。

体仁、江成留在了北大图书馆,张杰离开了图书馆界,罗丽、潘蕾(会计)、姜源绿、王晓红(当时是临时工)和我转战条装司,带着秘书处的一摊子工作,以及《大学图书馆学报》。

整个搬家过程耗时小半年,加上我们1990年下半年还在北大领工资,所以一直到年底秘书处才在国家教委红星楼(原址已经拆了建成教育部现在的北楼)208室条装司图书情报处的小屋子里挤下来。我还跑了一趟北京市委,将组织关系由北京市转到中央机关。

为了配合这次转移,1990年7月28日,条装司调整了图工委的班子:主任朱育理,常务副主任高炳章(条装司主管图书馆工作的副司长),副主任庄守经、王镭(高教司副司长),秘书长高炳章,副秘书长董哲潜、李晓明。这个调整以图工委的名义通报各地图工委和有关部门,以及图工委全体常委。

1991年5月21—23日,图工委召开了一次常委会暨图书馆工作座谈会。参加会议的除图工委常委外,还有各地区、各部委图工委(图协)的秘书长。已调离国家教委的图工委主任朱育理同志到会看望大家,国家教委副主任邹时炎同志到会并作指示。

会议讨论决定:

(1)1992年召开第四次全国高校图书馆工作会议,总结“七五”期间的工作,研究“八五”发展规划(此项工作未完成,第四次全国高校图书馆工作会议迄今未召开)。

(2)进一步修改、完善高校图书馆评估指标体系。

(3)组织图工委成立10周年纪念活动,包括:召开纪念会;《大学图书馆学报》出一期纪念专集;为1988年以来在图书馆工作30年的老同志颁发纪念证。

(4)制订图工委1991—1992年工作计划。

(5)图工委下设一个中小学图书馆工作组,协助行政部门推动中小学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其实这就是图工委2.0的前身)。

1991年10月,条装司和图工委在北大办公楼礼堂召开了全国高校图书情报工作委员会成立10周年纪念会。会后,部分在图工委秘书处工作过的同志合影留念(见图1)。



前排左起:葛耀良、朱强、肖自力、庄守经、罗宏述、王世儒、罗丽、杨学金
后排左起:周福宝、张玉川、陈体仁、姜源绿、李晓明、江成

图1 1991年高校图工委成立10周年纪念会合影

纪念会召开之前的9月26日,国家教委成立了面向全国大中小学图书馆的“国家教育委员会图书馆工作委员会”,是为前面所说的图工委2.0。所以,10周年纪念会实际上成为图工委1.0的谢幕会。



2 图工委 2.0 始末

1991年9月26日,国家教委发文成立国家教委图工委^[2]。文件指出,为加强中小学图书馆工作,在“全国高等学校图书情报工作委员会”的基础上,成立“国家教育委员会图书馆工作委员会”,配合行政部门,对全国大、中、小学图书情报事业进行研究、协调、咨询和业务指导。考虑到“全国高等学校图书情报工作委员会”在国内图书情报界的影响和高等学校图书情报工作的特点,继续保留“全国高等学校图书情报工作委员会”的机构名称。“国家教育委员会图书馆工作委员会”的日常办事机构是秘书处。秘书处沿用“全国高等学校图书情报工作委员会”秘书处的原有班子。秘书处的日常工作由条装司负责联系。

该文件没有宣布国家教委图工委的领导成员,只能理解为图工委 1.0 在 1990 年调整的班子继续领导图工委 2.0。继朱育理同志调离后,高炳章、庄守经、王镭三位副主任先后退休,1993 年下半年起,图工委的工作由条装司的主管副司长王富同志负责,但没有明确他在图工委的任职。

图工委 2.0 秘书处沿用图工委 1.0 秘书处的原班子。当时我们有“6 条半枪”:从北大过来的李晓明、罗丽、潘蕾、姜源绿、王晓红,到国家教委以后补充的郝雅梅;以图情处处长身份兼副秘书长的董哲潜同志算秘书处的半个人吧。图情处当时还有张环同志,后来增加了于勇。事业单位时期,曾有于波同志在秘书处工作过不到一年,没有计入上述人数。

秘书处在北大的时候,我们都拿北大工作证,工资、医疗、住房统统由北大负责,教育部每年给的 8 万元是纯工作经费。那时我们的年薪只有几百元,8 万元是百多位同志的年收入,想想能办多少事!记得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几个高校的图书馆学系轮流举办青年研讨会,图工委赞助一两千元大家就很开心了。到条装司以后,我们的工资、医疗、差旅、办公、后勤费用,以及《大学图书馆学报》的补贴统统从 8 万元中支出,用于事业发展的经费少了很多。司长、处长是行政编制,我虽然工作上不负责,却是 8 万元事业费的责任人。那时我最担心的事情是秘书处的同志生大病,医药费将无处筹措。幸好大家都年轻,小病难免,大病无缘。

作为事业编制,秘书处和国家教委其他事业单位一道,在 1992 年评过一次职称,我是副研究馆员,罗丽和姜源绿是馆员,由秘书处发给聘书。还赶上一次分房,从机关的大锅里分出一小块给所有的事业单位排队,我有幸分到一个小套。其他年轻同志排不上队,在北京没家的单身汉潘蕾和姜源绿继续住北大的集体宿舍。

我们大概是国家教委最小的事业单位,管理上想必比较麻烦。1993 年国家实行公务员制度,人事司将我们(包括王晓红)全都转成了公务员,事业经费和事业编制一道成为历史。条装司图情处同时是全国高校图工委秘书处和国家教委图工委秘书处,最多时有近 10 位成员。

图工委 2.0 期间,配合条装司以及高等教育司(以下简称高教司)所做的与高校图书馆有关的工作主要有:

1991 年 10 月 14 日,国家教委下发《关于开展普通高等学校图书馆评估工作的意见》^[3]。评估指标体系是图工委 1.0 在北大时期就开始调研的一项重点工作,国家教委以最高级别的文件(与《普通高等学校图书馆规程》一样,都是盖国徽章的文件)下发后,各地教育行政部门根据这个文件及其所附的评估指标体系陆续开展了评估工作。

1992 年 5 月印发《文献检索课教学基本要求》^[4]。1984 年,教育部曾发文要求各高校开设文献检索课,图工委 1.0 成立了文献检索课的专家组/教材编审组,编写过 20 多本针对不同专业的文献检索课教材。1991 年专家组在杭州开会时,遇到时任教委主任的何东昌同志,向他汇报了文献检索课的成绩和问题。何东昌同志后来责成高教司研究(条装司不管高校教学),于是制订并下发了这个《文献检索课教学基本要求》。1993 年,高教司成立了“文献检索课教学指导小组”,负责文献检索课的教学指导、教学大纲及教材的组织编写和审订工作。明确:该小组的宏观管理归口在国家教委高等教育司,有关教材的编写和审订工作仍委托全国高校图书情报工作委员会负责^[5]。

外刊协调工作。为解决当时外刊价格飞涨的问题,图工委下设的期刊专业委员会暨全国高校期刊协调网每年春天都要召开一次外文原版期刊的订购协调会,参与协调的高校图书馆分工承担高价刊的保障任务。这项工作直到 CALIS 牵头集团采购,国外纸本期刊逐步被电子刊取代以后才完成历史使命。为配合协调工作,委托复旦大学、浙江大学和西安交通大学图书馆分头编制的《全国高校图书馆外刊预订联合目录》和《全国高校期刊协调网外刊资源共享联合目录》是 CALIS 立项之前高校图书馆外文期刊联合目录的成功典范。



高校图工委统计工作。这项工作是1988年开始的,那还是图工委1.0时代。一直由姜源绿同志负责。20世纪90年代还是半手工操作,每年由各省图工委填报数据,有的省报软盘,有的省报统计表,姜源绿收齐后转入计算机汇总。这是现在的“教育部高校图书馆事实数据库”的前身。

在一些院校设立“高等学校科技项目咨询及成果查新工作站”^[6]。工作站由条装司归口管理,由高校图工委进行资格审查、协调和业务指导。1992年最早的12个查新站设在大连理工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天津大学、北京大学、东南大学、四川大学、华中理工大学、同济大学、西安交通大学、重庆大学、清华大学和成都科技大学,后来又有所增设。

接受美国“亚洲之桥”基金会赠书,每年几万册至几十万册。最早在青岛海洋大学设立赠书转运站,随着赠书量的增加,又增设了大连理工大学、同济大学和南开大学三个转运站。“亚洲之桥”的赠书主要从美国的一些出版社和书商处征集而来,前者如《国家地理杂志》《鸟瞰丛书》等,我国高校图书馆过去普遍没有收藏,从赠书中可以系统补充;从书商处征得的主要是大学教科书,有些是回收的二手书,复本较多,但版本略旧。新世纪很多高校开展英语授课,急需原版教材,有些老师发现了赠书中的宝藏,学生持旧版教材,老师将新版中的修订之处复印给大家。

继续编辑出版《大学图书馆学报》(以下简称《学报》)。《学报》随秘书处转移到条件装备司,却没有条件装备。虽说北大时代,编辑部也只是一两个人,但基本上是专职。《学报》先是在北大图书馆214室占据一隅,后来又增加222室为《学报》专用。到条装司以后,除我以外,罗丽和郝雅梅先后参与过《学报》编辑,但机关的工作规律和刊物的编辑出版规律不一样,时间上多有冲突。办公室拥挤就更不用说了,一人一桌都不能保证。那时发行还需要我们自己装好信封拉到邮局,经常是下班后全处同志在办公室门口的乒乓球桌上装信封,有时司里有事加不成班,成捆的《学报》只能堆在楼道里。后来北京图工委推荐了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退休的研究馆员杨治安老师帮我们看稿子,解决了一部分问题。1995年《学报》重回北大图书馆,才算一劳永逸安定下来。那以后我的工作重点转到CALIS。CALIS从1995年开始争取立项,编制项目建议书,提交可行性研究报告,这些工作都在条装司;等到CALIS正式立项,已经转到高教司管理了。

1992年前后,图工委编辑出版过一本《高校图书馆名录》,是以图工委名义,外聘编辑做的。我没有参与此事,不了解其始末,只记得该书在浙江大学出版社付印前,董哲潜同志委托我去浙江大学终审。我发现该书有很多硬伤,特别是英文部分,如西藏、内蒙古,以及在内地捐建了很多图书馆的邵逸夫先生的名字等,英译时直接采用汉语拼音。因为是清样,当时还是铅字排版,出版社不愿大改。以我的英语水平,尽力纠正了一些,肯定还有瑕疵。但是,作为当时唯一的高校图书馆名录工具书,它还是起到一定作用的。

1992—1996年承担过世界银行贷款师范项目的图书馆培训任务,先后在华东师范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四川大学、大连理工大学为师范院校培训了几百位馆长和采编、流通、技术骨干。馆长班还请美国俄亥俄大学图书馆的李华伟馆长来讲过两次课。

组团(高校图书馆团)参加1996年在北京召开的IFLA年会。

此外,图工委2.0配合图情处还做了几件倾力投入的工作,虽然不属于高校图书馆范畴,却应该在中国图书馆事业史上记上一笔:

制订《中小学图书馆(室)规程》^[7]。规程于1991年9月29日下发,图工委1.0的很多专家曾为之作出贡献。

国家教委自1992年开始实施“源泉工程”^[8],推动中小学图书馆藏书、中小学学生读书,组织出版社向老区中小学图书馆赠书。我去过延安和井冈山。

此后几年,陆续制订了各类型中小学图书馆的生均藏书量指标;每年请专家在出版社申报的基础上编制《中小学图书馆馆藏推荐书目》。当时各省都成立了与本省高校图工委并存,面向中小学的省级教委图工委,推动中小学图书馆事业有了很大的发展。

创办《中小学图书情报世界》期刊。张环的先生、华东师范大学研究生毕业的王海明请他的导师顾廷龙先生题写了刊名(顺便说一下,《大学图书馆学报》由启功先生题写的刊名也是王海明求得的)。也是限于人手,《中小学图书情报世界》1993年创刊后即委托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编辑出版,教育部机构改革后,这个刊物随中小学图书馆工作调整到基础教育司管理。

制订《中等专业学校图书馆规程》^[9]。这个规程于1997年下发,条装司没来得及推动有关工作。



3 图工委 3.0 的缘起

1998年,国务院改革机构,国家教委改回教育部。部内大规模缩编,条装司撤销,高校图书馆管理职能转到高教司。这一次跟着高校图书馆走的只有我一个人。当时还留在图情处/图工委秘书处的几位同志,董哲潜、张玉玲(潘蕾调到机关财务处以后,张接替他管图工委的账)退休,张环、王晓红去部属事业单位,郝雅梅出国留学,姜源绿、于勇到高教司其他处。调整之前,高教司钟秉林司长征求我对新岗位的意见,询问是否愿意在高教司担任其他职务。我表态:如果不能继续做图书馆工作,我愿意分流到在京部属高校图书馆做普通馆员。

高教司最后将我留了下来,并且担任教学条件处处长。

教学条件处管理教材、图书馆、实验室三块工作,由原高教司教材处、条装司图情处和条装司实验室处各留一人组成,基本上是一人管一块。过去高校曾有“三大支柱”的说法,指的就是条件处管的这三块工作。我曾笑称,三个老太太(另两位同志比我年长,都是50岁上下),一人撑着一根柱子。教材、图书馆、实验室三个处原有十多个人,编制压缩的力度非常大,教学条件处的工作压力也非常大。

1999年初,高教司在北京交通大学开教材工作会。期间,分管教学条件处的刘凤泰副司长约我散步,讨论如何推进图书馆工作。刘司长长期在高教司工作,对20世纪80年代前期由高教司联系的图工委记忆犹新。他建议参照高教司既有的各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的形式成立图书馆工作指导委员会。为体现与前两个图工委的承继关系,刘司长特别建议请庄守经同志担任指导委员会的顾问。

1999年8月11日,教育部下发了《关于成立“教育部高等学校图书情报工作指导委员会”的通知》^[10],并附图工委章程。教育部聘请北大主管图书馆工作的何芳川副校长为主任委员,郑州大学主管图书馆工作的崔慕岳副校长和戴龙基、刘桂林、秦曾复、张异宾、朱强等几位同志以及我本人为副主任委员,庄守经、沈继武、承欢三位老同志为顾问,阿拉坦仓等58位同志为委员,朱强兼秘书长。我担任指导委员会副主任是刘司长提名的,他说,我从老图工委一路走来,也是图书馆的专家。

和各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一样,新图工委是专家咨询组织,没有工作经费,也没有人员编制。委员们都是各大图书馆的馆长、副馆长,本职工作已经忙得不可开交;秘书处设在北大图书馆,和《大学图书馆学报》是一套人马,也没有时间像老秘书处那样组织业务活动。所以,图工委的工作全凭各位馆长对事业的热情,恪尽自己的义务。记得朱强在一次年会上谈到图工委的工作方法,提醒各位委员:“你就是图工委!”这就是图工委的精神,是指导委员会20多年来成功的秘诀。

致谢:

年代久远,档案不全,初稿多有疏漏。幸有罗丽、王晓红、张环、姜源绿、郝雅梅、王海明等当年同事对此文进行校订、补充,在此一并感谢。

参考文献

- 1 国家教委文件《关于全国高校图工委秘书处挂靠条件装备司的实施意见》(教人厅[1990]13号)。
- 2 国家教委文件《关于成立“国家教育委员会图书馆工作委员会”的通知》(教备厅[1991]33号)。
- 3 国家教委文件《关于开展普通高等学校图书馆评估工作的意见》(教备[1991]79号)。
- 4 国家教委文件《关于印发〈文献检索课教学基本要求〉的通知》(教高司[1992]44号)。
- 5 国家教委文件《关于成立文献检索课教学指导小组的通知》(教高司[1993]108号)。
- 6 国家教委文件《关于在大连理工大学等12所院校设立“高等学校科技项目咨询及成果查新工作站”的通知》(教备[1992]55号)。
- 7 国家教委文件《关于印发〈中小学图书馆(室)规程〉的通知》(教备[1991]70号)。
- 8 国家教委文件《关于印发〈柳斌同志在国家教委图书馆工作委员会实施“源泉工程”首届赠书仪式暨中小学图书馆工作研讨会上的讲话〉的通知》(教备[1992]5号)。
- 9 国家教委文件《关于印发〈中等专业学校图书馆规程〉的通知》(教备[1997]10号)。
- 10 教育部文件《关于成立“教育部高等学校图书情报工作指导委员会”的通知》(教高[1999]5号)。

作者单位: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北京,100816

收稿日期:2021年12月24日

(责任编辑:支娟)